

文/施一公, 饶毅

中国的科研文化



施一公



饶毅

编者按: 社会学家吴思先在他所著的《潜规则: 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 是这样定义“潜规则”的: 所谓的“潜规则”, 便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从常理来看, 谁都知道, 科研基金的分配, 应该基于研究项目的学术优劣, 而不是靠申请者拉关系。实际情况却是, “在中国, 为了获得重大项目,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 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2010年9月3日,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 在美国《科学》杂志上以社论形式联合发表文章“中国的科研文化”, 把中国科研文化中这一丑陋的“潜规则”, 毫不留情地明摆在了国内外科技界的面前。

施、饶两位教授的文章言辞恳切, 笔锋犀利, 切中时弊, 令人警醒。在我国现行的科研体制中, “潜规则”的可怕, 不仅在于“在中国, 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 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 还在于“绝大多数人接受了它, 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 更在于它“压抑了创新, 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 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所以说, 这种“潜规则”腐蚀了科研人员, 污染了科研环境, 败坏了科研道德, 滞制了科技发展, 戕害了科学精神。

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参与国际竞争、谋取安身立命的基础, 科研经费、科研项目是科学研究生存、发展的土壤, 没有了基础和土壤, 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在“潜规则”日益有迹象可能成为“明规则”的今天, 是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按施、饶两位教授的话说, “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 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 也正是尽快打破科研文化中形形色色的“潜规则”的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 本刊转载“中国的科研文化”中文版(原刊载于2010年9月3日《科学时报》), 仍然意义重大。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 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 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 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 部分归结于文化。

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 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 但是, 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 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 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十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 关键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 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 然而, 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 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 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 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 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 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 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 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 为了获得重大项目,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 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

而, 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 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 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 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 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 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 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 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 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 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 选择了沉默; 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 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 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 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 而不是靠关系, 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 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责任编辑 苏青)